

灾难预警切莫沦为形式主义

汤嘉琛



今日论语

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日前通报称,抚顺“8·16”洪灾已经导致63人死亡,101人失踪。新华社记者是在灾区采访时发现,在抚顺洪灾中受灾最严重的清原县南口前镇,相邻两个村庄的伤亡情况却大不一样——截至21日,南口前镇南口前村因灾死亡30人、失踪58人,而与该村仅一桥之隔的北口前村则是零伤亡。

灾难过后,有哀悼也应有反思。媒体报道提供了一个反思线索:辽宁省有关部门8月15日已对强降雨天气进行预警,明确要求及时转移受威胁群众;8月16日,辽宁省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再

次要求转移受威胁群众。同一场洪灾,两个村子为何受灾情况迥异?关键原因在于,灾难预警信息是否得到有效传达。在零伤亡的北口前村,村支书接到通知后迅速要求9名村干部挨家挨户组织村民转移,个别不想撤离的村民还被强制撤离;而那个伤亡严重的村子却仅有通知,出事后还试图以“村干部人手有限,难以挨家挨户通知”辩解。

两相对比不难看出,只要灾难预警信息及时地传达到了每个村民家里,少伤亡甚至零伤亡,完全是可以实现的;相反,如果灾难预警信息被基层干部以形式主义的作风对待,仅将它们贯彻在文件、通知里,势必会造成惨痛的后果。因此,有关部门或许应调查一下,那个伤亡惨重的村子的领导干部

们是否有渎职责任。

事实上,灾难预警机制沦为形式主义的案例,并非首次听闻。据新华社报道,在2007年云南腾冲“7·19”泥石流灾害发生前,当地政府部门见于各种文件、会议记录、领导批示的预警信息多达120多项,但受灾群众却没接到任何灾前预警或紧急撤离通知。以“纸上预警”应对灾难信息,难免导致很多不必要的伤亡。

天灾可畏,但“人祸”更需防范。与地震等暂时无法预测的灾难相比,由暴雨引发的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有一定的前兆和紧急疏散时间,如果预警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完全可以尽量减少人员伤亡。灾难当前,最怕预警信息被形式主义的官场积弊绊住,这种“人

祸”因素甚至比自然灾害本身的危险指数更高。

每一例“纸上预警”导致的悲剧,都应该引起深刻反思。因为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我们都免不了要与各种自然灾害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灾难预警机制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最近一段时间,各级政府部门都在开展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四风”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抚顺洪灾提醒我们:在灾难预警机制方面,形式主义的问题同样不容小觑。相关职能部门不仅应将平时的演练工作抓好、抓实,更应检讨以往那种“空对空”的“纸上预警”做派。唯有革除形式主义之弊,我们在灾难中才能更从容。



新民随笔

电脑故障的反思

连建明

最近,因电脑程序问题引发的证券市场交易故障接连发生;8月16日,中国光大证券策略投资部门自营业务因为套利策略系统出现问题,导致股票快速成交72.7亿元,上证指数瞬间上涨100点;8月20日,美国投行巨头高盛一个原本用来追踪客户购买期权投资需求的交易系统发生故障,错误地将客户对某些期权的交易兴趣当成实际交易指令发往交易所,导致部分股票期权合约价格暴跌,造成当天美股早盘交易动荡;8月22日,由于交易系统出现技术故障,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股票交易中中断三个多小时。

一个星期里,发生三起电脑造成的重大交易故障,虽然是个巧合,但反映出电脑故障造成的风险后果远大于人工操作的失误。由此,在这个离不开电脑的时代里,我们需要对电脑进行一些反思。计算机可以说是工业革命以来最重要的发明,大大提高了效率,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现在我们已经离不开电脑,很多地方电脑替代了人工操作,控制着很多重要的运行系统。

然而,这世界没有完美无缺的东西,电脑给人类带来巨大好处的同时,也会产生副作用,比如,伴随电脑产生了“黑客”,制造大量“病毒”,一旦电脑中毒,小的影响工作,大的会造成财产损失,现在“黑客”利用“木马”程序通过电脑窃取钱财的案件屡见不鲜。更大的问题是,由电脑程序控制的系统,一旦发生故障会造成大范围瘫痪,典型的是机场,如伦敦希思罗机场在这10年里,就发生过多次电脑系统故障,造成所有航班停止起降的机场瘫痪。

在资本市场,电子化甚至改变了投资模式,如现在流行的高频交易软件,其短时间内快速处理大额交易的能力,是人工操作无法做到的,但是,发生故障后果同样惊人,这次“8·16”事件光大证券使用的就是高频交易软件,这个中国证券史上最大的错单,让我们见识了惹祸的“威力”。

当然,不能因噎废食,时代不可能倒退,电脑只会越用越多,但是,我们需要对电脑可能产生的风险有高度认识,并制定更多的防范和应对措施。不能让电脑故障频频影响资本市场,打乱我们的生活。

敲响“家访不收礼”警钟

新民网论

“老师要来家访了,好紧张,求支招!礼品准备什么,会问什么问题?”临近开学,不少家庭迎来老师上门家访。近日,沪上某教育论坛针对“家访是否有必要”在网上发起投票,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反方竟远远多于支持方。

家访,作为充分了解学生在家庭情况的一种重要路径,一直以来,被教育界所推崇。然而,传统

的家访,说实话,已经变成了挺尴尬的事。现在大家对隐私权看得很重,担心老师到家里,会曝光诸多隐私。这也是让许多家长为难的。同时,老师家访,也要牵涉到教师的很多时间和精力。但这并不等于说,就不需要家访。在我看来,“家访”应该有时代特色。

要不要到学生家里“家访”,需要征得家长和学生的同意。“家访”地址可以灵活,可以在家长办公室、公园里、茶室里,只要能够有一个适合谈话的氛围就行。另

外,还可以“集体家访”,也可以通过网络视频沟通。

家访要不要送礼,这是个伪问题。师生关系理应是纯洁的,现在教育主管部门明确要求教师不能收受学生的礼物,有些学校要求教师不能赴学生的“谢师宴”,而教师如果借着家访之机收礼物,则会使家访的目的变得功利,从而亵污了师生的情谊。对此,学校也该用制度对教师敲敲警钟。以免家访误入歧途。(王军荣,全文刊新民网,网址 www.xinmin.cn)

新民新语

安静难得

郁晶陶

大多数人应该都讨厌噪声的。不过,据说有些“噪声”是故意设计出来的。比如,车门关闭时的“咣当”声。理想的“咣当”声能让消费者感觉这辆车坚如磐石,提高安全感。又如,电动汽车发动时产生的“噪声”。这是为了车辆启动时其他道路使用者能注意到,避免危险。

一个完全安静的世界是恐怖的。尽管如此,我们周围的声音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安静,是多么难得。

公共汽车上,是移动电视的声音。除了故障之外,没有什么能阻止它的播放工作,而且据本人观察,在高峰时段,其播放的广告数量似乎已经超过其他信息,不知道这有没有违反什么法规。乘客们早已学会忽视耳边的疲劳轰炸,各做各的事。在电视声中,有时还夹杂大声聊天、大声打手机的声音。

出租车上,是广告触摸屏滚动播放的声音。想静音也可以,只是右下角的那个小方块远不如其他广告键灵敏。不过,能静音已经不错了,在办公楼里时,你可没办法让电梯旁边的那块广告屏安静。这样的广告屏在国外倒是很少见,也许是国人和国内的法律都对噪声有超乎一般的忍耐力?

在公共场所希望得到安静,或许不够现实。那么在私人领域呢?

楼上的装修声,楼下的狗吠声,住宅边的空地上有人伴着音乐跳舞……除了忍耐,当然也可以去沟通,但效果取决于对方通情达理的程度。如果对方不愿改善,再找第三方来调解;调解不成,绝大多数也够不上处罚标准,那么上法院去起诉?好像不值得啊。旁人也会相劝,忍一忍就过去了。至于住宅的隔音设计有没有到位,隔音质量有没有人来监管,更是少人知晓。

只不过,如此对噪声习以为常,真的好吗?公共场所的习惯性喧哗,私人领域的频繁干扰,这样的状况是持续还是改变,关乎每个人的自由边界和权利保护,也关系到我们希望拥有一个怎样的生活环境。是愿意忍受别人制造的噪声,同时希望别人也能忍受自己制造的噪声,还是尊重别人希望安静的权利,同时希望自己的权利也被尊重?正如空气质量、水质清洁、食品安全一样,我们的耳朵对接收的声音有多大的选择权,法律如何保护这份权利,也是文明社会的标志。



签到有奖

《乡镇开会出新招,按时打卡十元钞。工作本应不迟到,如此规定百姓笑。》安徽省合肥市市长丰义乡乡日前出台一项考勤规定:乡政府工作人员按时签到,每天奖十元。目前乡党委紧急开会,已取消这一规定。

孺子牛画

自由谭

山东孝里镇因当地人“打洋工”而出名,这件事登上了《人民日报海外版》:孝里镇现有1000多人获得了在澳大利亚工作签证,工种涵盖电焊、水电、安装等。

这个镇的“打洋工”,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出国热”,有个显著的不同:即不再从事饭店洗碗或从事服务员等工作,而是通过手中过硬的技能漂洋过海,在海外受到广泛欢迎。

“打洋工”为什么又吃香?因为需求。目前,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职业技术行业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尴尬局面,多种专业技能岗位面临着较大的需求缺口。德国联邦职业教

育与培训研究所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到2030年,德国技术人员的短缺量将达到100万。“技工荒”的大环境为许多掌握相对应专门技术的中国工人到这些国家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机会。较之部分拥有高学历,但缺少硬技术的人才,他们更容易走俏海外。

孝里镇的技工到澳大利亚工作收入,已接近甚至超过了上海的白领。出国“打洋工”,经济收益高诚然是一个重要原因,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外从事技术工人的工作,其社会地位并不低人一等。在欧美一些发达

国家,重体力劳动者工资高是“国际惯例”,而且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比如“水电工”这个词,在西方发达国家就是一个很有含金量的代名词。

国内“技工荒”的呼声近几年来有增无减,现又闻“打洋工”吃香。西方国家到中国来抢技工的消息提醒我们:从事技术工人的工作并不低人一等,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不低人一等。我们的家长和大学毕业生要改变观念。大学本科和高职毕业后当技术工人,一样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当高级蓝领和技术工人一样吃香,在生产、科研中一样大有用武之

又闻孝里镇的“打洋工”

吴兴人

地。在德国,只有约30%的青年选择上大学,约70%的年轻人则选择不同形式的职业教育,但德国的技术工人还是供不应求,他们还专门到中国来培训技术工人。目前,已经有上百名中国人在德国汉堡空中客车总装厂从事设备组装、维修等技术工作。

“成功者”的含义是多元的。出水才看两腿泥。李斌为社会创造的价值,决不比一位专家教授低。我们需要千万个李斌式的专家。今后,大学本科生穿上蓝领的工作服,希望不再成为一则新闻。